

專題研究

# 轉型中的臺灣意識

Taiwan Consciousness in Transition

虞義輝 ( Yu I-Huei )

國防管理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 摘要

2004 年總統大選之後，「臺灣意識」再度引起國人的關切，但什麼是「臺灣意識」？他等同「臺獨意識」嗎？為什麼這條源遠流長在臺灣人民心中的江河會有如此的轉折？為什麼百年來臺灣人民所面臨的每一次重大轉折都脫離不了失望、悲憤、不滿、抗爭、期待、再失望的輪迴中？在兩岸互動的歷史過程中不斷呈現的「臺灣意識」又醞育了那些內涵？仔細探索，發現「臺灣意識」本身並無對與錯的區別，也沒有統與獨的差異，它只是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適時的反映了臺灣人民的心聲，但不同背景、不同目的的人，會有不同的詮釋。重要的是臺灣意識不應該被定型化，因為它是一個仍在不斷發展轉變與時俱進的概念，它會因外在的刺激與內在改變呈現不同的面貌。

關鍵詞：意識、臺灣意識、中性、與時俱進

2004 年總統大選，陳總統以 647 萬 1,970 票贏得勝選，這個結果反映了臺灣有一半以上的人民選擇認同了以臺灣意識較明確的民進黨做為他們繼續支持的政黨，而「臺灣意識」是否就等同「臺獨意識」，卻是值得玩味與探究，雖然日前總統特別強調「臺灣主體意識」的抬頭並不意味著「臺灣獨立」的政治宣示，但仍有部分人民不認同；而蕭萬長先生在華府演講時也提出：陳總統的連任，反映了「臺灣意識」的強化，特別是年輕的一代，但這種意識不應被解讀為「支持臺獨」也同樣反映了這個觀點<sup>1</sup>。但這樣的論述是否能被廣大的群眾理解與接受，本文試圖從「臺灣意識」的形成、轉折到如今的各種面向做一探討，或許可以釐清此一現象。

<sup>1</sup> 中國時報（臺北），民國 93 年 4 月 8 日，第 A2 版。

## 壹、意識的形成與不完整性

在探討「臺灣意識」之前，須先對「意識」一詞稍加界定與說明，以利對臺灣意識的發展與轉折有較清楚的認識。

所謂「意識」(Consciousness)可以是宗教的觀念，可以是形而上學和哲學上的問題，也可以是科學與心理學上的問題，更可以是常識、日常用語上的觀念。心理學家常使用「意識」來描述關連到個人和外在世界關係的心理狀況。而這樣的聯繫產生的意識是經由三個主要的過程所完成，首先是「感覺」(Sensation)其次是「知覺」(Perception)最後形成「意象」(Images)。所謂的「感覺」就是藉由身體的聽覺、視覺所接受到的外在刺激。但若只有感覺是不能構成複雜的意識現象，因為單純的感覺是散漫的、無系統的，而第二層感受「知覺」就是將這種單純零散的感覺經驗作有系統整理，使其形成一致的經驗。而第三層的「意象」則是經過時間累積的知覺經驗深化而成。也就是當外在刺激消失後，由於過去的經驗，個人仍有自發性的反應，這就形成了個人的意識。換言之，感覺是單純的、原始的外在刺激反應，知覺是第二層有系統的感覺，但他們的材料都是共同的，就明顯性看感覺比知覺為強，但就統一性看感覺又比知覺散漫，而意象則是感覺和知覺的再現，其材料是來自知覺的統一性。而社會意識、民族意識就是無數個個體意識所匯集成型的<sup>2</sup>。

由於每一個人的接觸環境不同，過去的經驗背景不同，同樣的外來刺激也會有不同的感受與反應，因此意識就有他的多元性與不齊全性。所謂多元性，就像一個人可以有多重的「認同」，也像一個人在生活裡有層層的聯繫網，每個人都可能根據事實，依其自覺，形成各種「意識」。例如說，一個人可依其血統關係，產生宗族、民族等意識；也可能依生活範圍或出生地，產生鄉土、省籍、國家等意識。這些不同性質的意識，可能相輔相成，產生更強烈的高一層意識；由於多方面的「支持」，使這種觀念「牢不可破」。也可能互相矛盾，造成人與人之間的衝突，甚至擴大而造成社會人群的敵對；但也可能因重要性不同，造成暫時，或長期的不穩定現象。重要的是，同一環境、同一情境，不一定產生相同的意識，有時甚至產生相反的意識。因為人對環境反應，可能出自本能反射，也可能依感情、或由理智決定，凡此都造成意識之多元性<sup>3</sup>。

其次是意識的不完整性，「意識」要經由個人透過「感覺」、「知覺」、「意象」所

<sup>2</sup> 嘉爾文赫爾著，關人吉譯，意識心理學（臺北：五洲出版社，民國51年10月初版），頁6-17。

<sup>3</sup> 黃國昌，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臺北：五南出版社，民國84年），頁5。

產生並逐漸形成社會性的觀念，除了它要有「事實」基礎，更要有廣大的涵蓋面。

儘管「意識」的社會性要求其「完整」、「全面」性，但在個人的層次上，它則經常是不完全的、不整齊的、甚至是片面、片斷性的。由於個人經驗與智慧的不同，「認知」和「自覺」的程度與範圍顯然有別，而且對同樣的環境也會做出不同的「認知」選擇（alternative），甚至形成「失調」狀況（Dissonance）。雖然無數的「片斷」、「片面」聚集在一起，仍然可以造成個人「整體」的形象，但這不代表事實與環境的「整體形象」。即使個人有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意識，但其間因個人主觀的認知，仍可能有強度不同的情形存在，因此個人常將「片段」「零散」「主觀」的感覺逐漸形成「整體」「全面」的意象並深植心中，這正是意識的不完整性<sup>4</sup>。因此我們要討論的「意識」可隨人而異，但它要體現在社會中，就必須將各個主觀、片面的不同看法，經過歸納導引出一個全面且周延的意識，才能發生「作用」。所以意識是人所特有的，反映客觀存在的最高的形式，而社會意識更是社會存在的反應。

上述是對「意識」的形成與多元性、不完整性做一個扼要的敘述，其次再進一步探討「臺灣意識」。

## 貳、臺灣意識的原形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是臺灣歷史的轉捩點，亦是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一次重要挫折與病變。當大陸的中國人面臨民族的破碎危亡，並開始激烈地為國家建構的性質及方向爭戰不休的時候（如立憲派與革命派之間的鬥爭），臺灣的中國人即需要為國家認同的對象立即作出選擇。根據1895年馬關條約規定，條約批准及換文之後兩年，臺灣居民可依自由意志處置其財產後遷出臺灣，但限期屆滿後仍未遷出者，則一律被視為日本臣民。換言之，在國籍上經過了自由選擇後，臺灣人和中國人開始有了區分<sup>5</sup>。從那時候起，臺灣人民的命運便被投入一個與中國國家建構過程完全不同的歷史里程。

戴國輝教授在「臺灣結與中國結」一書中明白指出：「中華民族主義是藉日本帝國主義對我侵略的行徑，當為反面教師而孕育出來的。因為臺灣是首先受到日本帝國主義凌辱的中華之地，因此，中華民族主義在臺灣的萌芽及成長比大陸任何省份都要來的早、來的快。」<sup>6</sup>

<sup>4</sup> 同前註，頁6。

<sup>5</sup> 楊聰榮，文化建構與國民認同：戰後臺灣的中國化（臺灣：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1992年），頁82-83。

<sup>6</sup> 戴國輝著，臺灣結與中國結（臺北：遠流出版社，民國83年，初版），頁57。

事實上，戰敗割地對國家民族而言，實為奇恥大辱，而「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更引起臺灣與大陸朝野同聲反對與憤慨。割臺對臺灣人民而言，猶如被父母拋棄之子民，在求助無門，外援不成之下，臺民均至撫署，盤問臺灣巡撫唐景崧「臺民何辜，致遭歧視？」<sup>7</sup>於是全臺紳民在工部主事丘逢甲領導之下，上書唐景崧代奏，謂「臺灣屬倭，萬姓不服，…百姓無依，惟有死守，據為島國，遙戴皇靈。…臺民此舉，無非戀戴皇清，圖固守以待轉機。」<sup>8</sup>另以臺灣議院名義布告全臺，照會各國領事，發表檄文，曰：

「我臺灣隸大清版圖二百餘年，…日本要索臺灣，竟有割臺之款，事出意外。…臺灣唯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臺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國，作何處理。…倘中國豪傑及海外各國能哀憐之，慨然相助，此則全臺百萬生靈所痛哭待命者也」<sup>9</sup>。

可見當時臺民內心之痛與對中國之依賴。

當時臺灣紳民決定根據國際公法的「割地時紳民不服」為理由，來抗拒日人的侵占。於是改臺灣為「臺灣民主國」，建元「永清」，意在不忘大清，並願「遵奉正朔，遙作屏藩」，並於 1895 年 5 月 16 日公推臺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sup>10</sup>。

當日本接收人員來臺之際，主張民主政治的臺灣民主國發表獨立宣言，其文曰：

「…臺灣全島自立改建民國，官吏皆由民選，一切政務從公處置。但為禦敵及推行政事，必須有一元首，俾便統率，以維秩序而保安寧，巡撫兼署臺灣防務唐景崧，為人民所敬仰，故由會議公推為民主國總統。」<sup>11</sup>

當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於 5 月 26 日在前清巡撫署西側舉行「總督府始政典禮」之際，臺灣也正式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同時臺灣民主國亦告結束<sup>12</sup>。然臺灣人民在無法獲得中國精神上與實質上支援與滿足的情形下，遂將中國意識轉化為臺灣意識，先求獨立自保，再待機回歸中國，因此，可以了解臺灣人的意識是在共同的武力抗日中開始萌芽，是在民族自救運動中與反殖民地統治下形成的臺灣人共識<sup>13</sup>。

<sup>7</sup> 仲崇親著，臺灣史略（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7年3月），頁147。

<sup>8</sup> 同前註，頁149。

<sup>9</sup> 李純青著，臺灣論（臺北：人間出版社，1993年9月1日），頁54-55。

<sup>10</sup> 王詩琅著，清廷臺灣棄留之論——臺灣史論（卷四）（高雄：德馨室出版社，民國68年6月），頁73-75。

<sup>11</sup> 殷允芃等著，發現臺灣（下冊）（臺北：天下雜誌，1998年2月初版五刷），頁320-321。

<sup>12</sup> 陳清敏、黃昭仁、施志輝等著，認識臺灣（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85年11月），頁190-191。

<sup>13</sup> 黃文雄，臺灣國家的條件（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年10月），頁61。

王曉波在《臺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一書中即說：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原點」是抗日，抗日的「原點」就在臺灣<sup>14</sup>。而這一戰——甲午戰爭，自此也割開了臺灣與中國的臍帶關係。

而「臺灣意識」也開始在臺灣落地生根。由此可以看出「臺灣意識」的原形是在對中國的失望、不滿、無奈下混夾著難以割捨的父祖之情與期待「祖國」強大中成形。

### 參、臺灣意識的轉折

何以從日據時期的國家認同危機，異族統治，到臺灣人民的民族自救運動，在無時無刻期待「祖國」強大與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願景，開始有了變化？雖然國民政府轉進臺灣時期，仍以中華民族正統自居，對中共馬列邪說大肆抨擊，在臺灣生聚教訓、整軍經武，企圖使她成為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根據地，何以到了今天，臺灣意識的成長卻發展出完全不同的方向，是什麼原因改變了這個趨勢？使兩岸漸行漸遠，甚至國家認同的模糊，是哪些因素使這條原本源遠流長在臺灣人民心中的江河開始有了轉折？這些變化從意識層面看可以說都是形成臺灣現階段主體意識的基礎結構。而這一百多年來兩岸的變化和作為正是這個基礎結構的原料。

#### 一、皇民化運動的失敗

日本據臺之後，臺灣人面對的第一個難題與第一次重大的辯論，就是關於同化與否的問題。

日本對殖民地的政策從據臺之初就存在著殖民地統治策略的兩條路線之爭，第一條是後藤新平所代表的「特別統治主義」。醉心於德國式「科學的殖民主義」的後藤認為從生物學的觀點，同化既不可能也不可欲。因此主張效法英國殖民統治方式，將臺灣等新領土視為「殖民地」，亦即分離於「內地」之外的帝國屬地，不適用內地律法，必須以獨立特殊的方式統治。另一條是首相原敬所代表的「內地延長主義」，主張將新附領土視為「雖與內地有稍許不同，但仍為內地之一部」直接適用本國法律制度，是一種以制度同化為先導，逐漸達成文化同化之「漸進內地延長主義」。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政治力學（political dynamics），是當時日本國內的同化派、反同化派與臺灣人三者間微妙互動的結果<sup>15</sup>。

<sup>14</sup> 王曉波，《臺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臺北：帕米爾書局，1986年11月），頁44。

<sup>15</sup> 吳登人，「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公司出版，2001年4月），頁51。

在臺灣，第一次的同化主義爭論始於 1914 年的同化會運動。在這場爭論當中，臺灣人與日本內地的同化主義者結盟，站在支持同化的立場，與臺灣和內地的日本人反同化主義者對立。主張改變當時特別統治主義對臺灣人的差別待遇，視臺灣為日本內地的一部，給予臺灣人完整的日本公民權，並在文化上積極將臺灣人同化為日本人。這個運動主要的支持與推動者即為當時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傳奇領袖板垣退助伯爵，也因為這個緣故，在較年輕的臺灣受教育階層與紳商之間廣受歡迎，在短時間內就募集了三千多名臺灣人會員。雖然如同矢內忠雄所言，臺人所求者即為其旨趣書上所言之「與內地日本人同樣的待遇權利」。然而他們不可能毫無意識到享受此等權利將要付出的文化認同代價<sup>16</sup>。

事實上，對於臺灣人民應採同化或反同化運動在日本國內一直受到相當的爭議與討論，就在最支持同化運動的板垣離臺後一個月，臺灣總督府就以「妨礙公安」為由解散同化會。由於明治藩閥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所強力塑造的日本民族意識本身還在形成之中，因此對「外來者」仍然會有強烈的抗拒。另一方面，臺灣人熱烈支持同化會運動反映了他們對急進的內地延長主義的支持，然而運動的失敗使得臺灣許多知識分子開始對整個「同化主義」的理念（不論是急進或漸進）產生了深刻的懷疑<sup>17</sup>。

同化運動的失敗可以說是臺灣人為因應新的政治現實而作的一次認同選擇嘗試的挫敗，也是臺灣人在日本歧視性的「官方民族主義」統治下認同的困境，滿清棄臺，已經做不了中國人，同化失敗又做不成真正的日本人，在這樣的環境下，臺灣菁英很無奈，很清楚的覺悟到或許他們只剩下一條路可走：既然做不了中國人和日本人，就讓我們作「臺灣人」吧。從確立了「作臺灣人」這個認同選擇的角度觀之，這個短暫而重要的論爭，其實見證了一個以臺灣為範圍的殖民地民族主義萌芽<sup>18</sup>。然而這個萌芽中的「臺灣人」意識，其內涵卻充滿著萬般的失望、無奈與怨恨及對未來的茫然無知。

## 二、光復後對「祖國」的失落感

五十年殖民統治的「皇民化」，並不能真正消滅根植於臺民心底的漢民族意識或「祖國」意識。所以，一旦日本投降，還沒有等到正式的光復，臺民的興奮之情就表現無遺。臺民第一次的雙十國慶，並不是正式光復後的 1946 年 10 月 10 日，而是尚未正式光復之時的 1945 年 10 月 10 日，在日本統治者猶控制整個臺灣的時候，全

<sup>16</sup> 同前註，頁 52。

<sup>17</sup> 同前註，頁 54。

<sup>18</sup> 同前註，頁 56。

省臺胞在各地自動的熱烈慶祝祖國的國慶日。至國軍的接收部隊來臺時，更是拿著國旗到基隆碼頭，夾道歡呼。這種情況和五十年前日本軍隊來臺，正好成一鮮明的對比。但不幸的是，在這歷史的關頭，臺胞用五十年血淚歡迎來的祖國，竟是如此軍紀蕩然的一群！高度期望的落空，失望和挫傷是可想見的<sup>19</sup>。

監察使楊亮功說：臺灣淪陷日人之年逾五十年，臺省同胞年在五十歲以上者，因不乏國家觀念濃厚之人士，然中年以下之同胞，在此五十年中，一切文化教育均受日人之奴化麻醉，多數臺胞不惟對於祖國之情況無從了解，即中國之歷史、地理、文化等情形，亦深受日人曲解宣傳之影響，及至光復當時，臺胞初謂祖國為五強之一，必遠勝日本，是以對於初蒞臺灣之政府接收人員均報以熱烈歡迎，寄以無窮希望。年餘以來，漸覺國內狀況不能如期所望，及日人統治臺灣時一切政治經濟設施均較有條理較有規劃，盡其不了解祖國十餘年軍閥內亂、九年對日抗戰及共黨不斷紛擾之艱苦奮鬥情形，僅以目前情形與日本統治情形，斤斤計較遂於熱烈希望之餘而漸為懷疑，漸為失望，終至輕視，以日人不若，而發生離心現象<sup>20</sup>。

監察使楊亮功的一席話正道破兩岸間認知的差距與失落感。臺灣人民對日本戰後投降的消息，反應狂喜的民眾，並沒有能夠認真地去思辨「光復」的深層內涵，只有單純無邪地相信，回到祖國懷抱，脫離往昔的殖民統治，一切苦難將迎刃而解，臺灣展現在眾人的面前，是一片瑰麗光燦的前景，一一並雜奏著對日戰爭的勝利狂歡曲和迎接光復的幻想曲。臺民的熱情來自於被隔離、被割棄而生的補償心態「戀母情結」。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是既純樸又天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sup>21</sup>。正因為與中國政局的隔離已有半世紀之久，不但對國府的黨、政、軍、特的結構與內部派系關係不知悉，對國府所背負的傳統政治文化也一無所知，對國軍所面對的各項戰役也全然不知。臺灣人民可以說完全無法了解這五十年「祖國」人民是如何在列強欺凌，烽火連年，民族自尊蕩然無存下求生存。這樣的認知差距，突然結合在一起，勢必造成國府與臺民間誤會之加劇。

### 三、二二八事件

中國近代史上最近一次臺灣與大陸人民的互動激盪應屬民國 36 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而這次事件對兩岸人民造成的傷害卻更甚於以往，尤其在臺灣割讓給日本五十年後重返「祖國」的懷抱，臺灣同胞在歡欣鼓舞，舉國歡騰下所受的創傷更是難以撫平。

<sup>19</sup> 王曉波，臺灣史與臺灣人（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77 年 12 月），頁 161。

<sup>20</sup> 簡榮聰，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81 年 2 月），頁 126-130。

<sup>21</sup> 同註 6，頁 66。

然而這起歷史的偶發事件，卻造成了今天臺灣島內分離意識的一支源頭，使原本應該血濃於水的中華民族被再一次的劃上了一道裂痕<sup>22</sup>。監察使楊亮功在事後給蔣委員長的分析報告就提到：

臺灣自 2 月 28 日因臺北取締私煙販賣發生糾紛釀成命案，不旬日全省十七縣市幾無地不發生紛擾事件。其肇事原因似甚簡單，然綜析實情釀成此次全省紛擾原因實醞釀已久，且甚為複雜。茲述其重大者如下<sup>23</sup>：

- 臺灣人民對於祖國觀念之錯誤
- 日人之遺毒
- 物價高漲與失業增加之影響
- 政府統治政策之失當
- 一部分公務員貪污失職及能力薄弱之影響
- 輿論不當之影響
- 政治野心家之鼓吹
- 共黨之趁機煽動
- 治安防衛武力之薄弱
- 廣播、無線電臺為暴民控制之影響

楊亮功在其分析原因的第一點即已道出問題的關鍵，亦即臺灣人民對於「祖國」觀念中想像的錯誤。「二二八」事件的原因除了臺民主觀的認知落差外，外在客觀環境與臺民心理同樣造成不可忽視的影響。相對「祖國」的官員和軍隊，他們哪有可能懷著崇高的國家意識，任重道遠的歷史使命感，把接收臺灣的問題提到與「安邦治國」不可分的高度來認知。已習慣於日本統治下守法和循法辦事的臺民，當然看不慣這種做法。毋庸諱言，急於求成的心態必然地形成了急躁冒進的不平衡心態。對祖國的強烈願望及期許逐漸落空後，繼而生起失望、絕望甚至怨懟，這些累積成堆變為乾柴，而「二二八」緝查私菸事件，正是那根點燃乾柴引發熊熊烈火的一枝火柴，瞬息之間，卻演變成全島各地蜂起的動亂。也正因這枝火柴造成了中華民族原本一脈相傳的中國正統思想開始病變<sup>24</sup>。

而「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不僅是臺灣史上的悲劇，也是近代中國史上的一大悲劇，事件的發生距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回歸中國，僅僅十八個月。自 1895

<sup>22</sup> 虞義輝，臺灣意識的多面向（臺北：黎明公司，民國 90 年 11 月），頁 87-88。

<sup>23</sup> 同註 20。

<sup>24</sup> 同註 6，頁 67。



年甲午戰爭後至今，在這長達百餘年的時間內，兩岸也僅有四年（1945～1949）的時間算是統一的，可惜的是這四年統一的經驗卻是痛苦的回憶。

江迅認為：臺灣意識的產生是在二二八事件以後才有的，在此之前，臺胞則充滿了「重歸祖國懷抱的興奮之情」<sup>25</sup>。

但筆者以為「臺灣意識」是從二二八事件後，開始有了明顯而具體的轉折。

#### 四、國共對峙的隔離時期

日本統治期間，為了切斷原本屬於中國土地一部分的臺灣及其人民，臺灣總督府對當時臺灣人民出境，前往中國大陸更是嚴格限制。也因此，日本政府把如何將臺灣和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社會、心理的關係一刀切離，當做一項重大課題來加以設計、執行。其目的就是要切斷屬於漢民族的臺灣人民對大陸的傳統和既有的人際來往，並防範由臺灣人做主等自發性的行為<sup>26</sup>。

然而五十年後，1949年國民政府轉進臺灣至1987年解嚴前的四十年間，臺灣人民在「漢賊不兩立」「國共不並存」及「殺朱拔毛」的政治口號下，相互敵視、攻擊、醜化，使臺灣人民又失去了一次兩岸相互了解的機會，因此經過日本殖民統治後，對中國產生疏離的臺灣人民，在國府統治期間，更進一步與具體的和中國隔絕起來，造成近一百年來兩岸人民雖然近在咫尺，但卻在民族情感和相互認知上的空白、誤解與仇視。而國民政府的長期反共宣傳和對中共政權的妖魔化，也造成臺灣人民對大陸的恐懼和不信任，這不止是臺民日益疏離中國的原因，更是形成臺灣分離意識的因子。

#### 五、中國的打壓

有人稱「馬關條約」割臺賠款，這種被遺棄的心理為「養女命」，因為臺灣被它的生身父母出賣給了日本<sup>27</sup>。對臺灣人民來說，這種被遺棄與無奈的心理，實質上就是臺灣人民內心尋求當家做主的潛存意識。從這個角度來看，臺灣人民很有理由從民族主義的立場要求其「父祖之國」的中國，提供適當的或更多的補償來撫慰流落異鄉，缺乏母愛照顧並心靈受創的臺民，就算得不到補償，也應該有一個合理的對待，那能忍受來自「父祖之國」一再的威脅恐嚇<sup>28</sup>。

事實上，北京當局一連串對臺灣人民在國際活動空間的排擠、外交上的打壓以及武力的威懾恫嚇，對臺灣人民而言，可以說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傷害與撕裂，雖然

<sup>25</sup> 江迅，臺灣意識論戰（臺北：公司，民國90年11月），頁27。

<sup>26</sup> 呂秀蓮，臺灣的過去與未來（臺北：拓荒者，1979年），頁61。

<sup>27</sup> 臺灣總督府編纂，臺灣總督府法規提要（臺灣：日日新報社，1914年6月25日發行），第五輯外事24頁。另參閱戴國輝，臺灣結與中國結一羣丸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頁236-240。

<sup>28</sup> 同註22，頁142。

北京當局口頭上再三強調「寄希望於臺灣人民」，但從其作為上看，卻不斷強調所謂「不排除以武力統一」、「必要時有能力封鎖臺灣」、「將採取斷然措施」之類的威嚇，再加上布置於福建沿海各地對著臺灣人民的飛彈，這樣的作為要如何讓臺灣人民放心，相信和中國的整合是有利的，這一切難道是中國對疏離近百年的臺灣人民所做的補償麼？

誠如中時社論所說：北京當局的盲點在於，到現在為止在思惟上還不願意完全「脫內戰化」，認為在 1949 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完全取代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已經不復存在，至於現實上存在於臺灣的中華民國，只是敗退的殘餘政權而已。而為了否定這個事實上還在臺澎金馬有效行使主權的「中華民國」，北京竭盡所能的在國際社會進行「去中華民國化」的工程：摘除中華民國在所有國際組織的會籍、減少承認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數目、讓中華民國的國號、國旗在所有正式的國際場合消失等，這個政治工程確實讓臺灣飽嘗被國際社會排擠與孤立之苦。然而它對臺灣內部所締造的最直接效果，不僅是讓臺灣民心與北京的距離拉得更遠，更讓臺灣內部的獨派勢力找到「去中華民國化」的著力點，臺灣正名運動正是這樣背景下的產物。我們可以這樣說，北京與臺獨團體其實是不約而同一起在消滅中華民國<sup>29</sup>！

而中共當局若不能站在臺灣人民的立場去用心體會臺灣人民的想法，仍用內戰的思維處理兩岸問題，結果只會將一個已經受傷並失去母愛的孩子越打越遠，也會使臺灣意識去中國化的內涵越來越被強化。

#### 六、臺灣政治人物的影響

臺灣意識的逐漸強化，應從蔣經國先生晚年加速推進「本土化」「民主化」的政策來疏導黨外勢力對國民黨執政地位的衝擊，所發出的「我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的呼籲<sup>30</sup>。其次李前總統的主張，從「生命共同體」、「經營大臺灣，建立新中原」、「新臺灣人」到「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一連串地轉型過程中，臺灣人的自主意識越來越被強化。李登輝在 1997 年接受日本人古森義久的訪問，強調他任內施政兩大重點之一是臺灣意識的強化<sup>31</sup>。仔細閱讀李前總統不同場合講「新中原」在臺灣的說法，可以發現，臺灣之所以變成新中原的理由無非是臺灣與中國的差異性，而這個差異是臺灣比中國為先進，先進的內涵主要是政治民主和經濟繁榮，這是中國以及中國傳統文化所欠缺的兩樣東西。在策略上，李總統要島內具有中國意識強烈的人士相信，

<sup>29</sup> 中國時報（臺北），民國 93 年 5 月 28 日，第 A2 版。

<sup>30</sup> 才家端，夏潮基金會編，「是論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辯證統一」，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臺北：海峽出版社，民國 88 年 6 月初版），頁 547。

<sup>31</sup> 參見古森義久，「臺灣李登輝總統會見記」，正論（1998 年 3 月），頁 128，134-135。轉引盧建榮著，分裂的國族認同（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8 年 2 月 15 日初版），頁 271。

臺灣雖是中國地理上的邊陲，卻是文化上中國的核心，在中國的架構下，臺灣是未來新中國的典範<sup>32</sup>。但是，這樣的論述，對於臺灣社會每到選舉就操弄族群議題的政治人物而言，並沒有凝聚成為一個「新興民族」，或者理論家口中「想像的生命共同體」<sup>33</sup>，所以在民國 87 年底的「三合一選舉」，李登輝喊出了「新臺灣人」的口號，他要「新臺灣人」一定要告別悲情，快快樂樂迎接新世紀，讓世界看到中華民國的民主成就。很明顯的，「新臺灣人」的詮釋，正是居住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不論是河洛人也好、客家人也好、外省人也好、原住民也好，都因為他們的生存發展，和這塊土地息息相關，而這個口號，對於臺灣族群的融合，也產生重大的正面意義<sup>34</sup>。

由於政治人物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中順勢引導，使部分仍對中國懷有憧憬的臺灣人民開始認真的思考何處是安身立命的處所？並逐漸認同這塊土地，最後將「他鄉」變成「故鄉」。

#### 七、臺灣社會的民主多元開放

1987 年 7 月正式解除戒嚴令，代表著臺灣政治自由化的一個分水嶺，同時開啟了進一步民主化的階段。解嚴之後，臺灣人民掙脫了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與箝制，民間社會的多元聲音開始蓬勃綻放，展現了活潑的生機。相較於解嚴之前的年代，臺灣社會最值得注目的變化可說是民間團體的興起以及有組織社會力的躍升，而伴隨人民自主意識的覺醒以及積極介入公共領域行動而來的則是所謂「臺灣意識」的隱然成形，它展現於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層面，型塑當前臺灣社會群體意識的基礎<sup>35</sup>。

兩岸交流之後，居住在臺灣地區的人民，由於來臺時間與背景的差異，使原本潛藏於臺灣人民內心深處的不同認知，逐漸引爆出來，而分流形成多元的臺灣社會三個主要意識，臺灣獨立意識，統一意識，與自主意識，而這三個意識也正好包容反映了臺灣全體人民不同的心聲，並逐漸形成「臺灣意識」的主要論述。而國民黨的敗選，政黨的輪替，更凸顯了臺灣人民想法的轉變。正如民進黨立法委員所說：歷經民進黨四年的執政，以及兩次總統大選的洗鍊，所謂「臺灣主體性」乃至於「臺

<sup>32</sup> 盧建榮，分裂的國族認同，分裂的國族認同（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8 年 2 月 15 日初版），頁 271-273。

<sup>33</sup> 張茂桂，「新臺灣人之非論」，國策專刊（臺北），第 7 期，頁 4。

<sup>34</sup> 邱勝安，「新臺灣人效應」，新聞鏡周刊（臺北），第 527 期，頁 39。

<sup>35</sup> 蕭新煌，「社會文化轉型：背景、內涵與影響」收錄於施建生編，一九八〇年代以來臺灣經濟發展經驗（臺北：中華經濟學院，1999 年），頁 226。

灣國族主義」的建構，正持續的躍進與強化<sup>36</sup>。蕭新煌即說：臺灣意識的成形是過去一百年來臺灣住民持有集體經驗的歷史教訓和結晶<sup>37</sup>。而臺灣社會的民主開放，正好提供了臺灣人民發洩潛藏壓抑於內心世界已久的一個平臺。

回顧上述這七個因素，不難發現臺灣人民百年來從原本一心嚮往回歸「祖國」的孺慕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負面的刺激與影響，進而內化、深化，終於轉變到今天2004年總統大選，結果有一半以上的人民選擇了疏離中國。也可以說是從1895年滿清割臺之後，臺民心中所潛藏的「臺灣意識」從原始的懷抱、認同「中國意識」逐漸轉變走向認同具有濃厚「臺灣獨立自主意識」的「臺灣意識」過程。

然而這樣的發展過程是否就意味著「臺灣意識」的內涵已經成熟定形？是否已經呈現了臺灣人民集體意志的共同願望？以下再繼續探討臺灣意識的內涵。

## 肆、臺灣意識的內涵

臺灣意識經過了百年來的轉折變化，始終難以一窺其全貌，因為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背景有著甚至完全不同的觀點，就筆者的研究與有關資料的參考，對臺灣意識的內涵實難給以明確的界定，表面上看似乎是不證自明的，但細加探究，卻充滿了很大的想像空間，或者說是似是而非，卻又未經過嚴謹的界定，甚至是一種仍在發展尚未成型的概念，為避免造成一家之言，而使「臺灣意識」的內涵失之偏頗，本文將引述兩岸學者專家對「臺灣意識」的解讀與認知，使讀者能從不同的觀點看到一個較完整的面貌。

首先看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黃俊傑的觀點<sup>38</sup>：

自從1987年7月戒嚴令廢除以後，「臺灣意識」從過去潛藏的狀態，如火山爆發似地一湧而出，成為後戒嚴時代臺灣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但是，所謂「臺灣意識」是臺灣思想史的一個重要現象，內涵至為複雜，在歷史上也有其段落清楚的發展過程。到底臺灣意識的思想內涵如何？經歷何種發展階段？未來展望如何？這些都是最近十餘年來「臺灣意識」從潛藏到外顯的發展過程中，所激發的問題。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臺灣意識」的發展，可以分為四個歷史階段：明清時代的

<sup>36</sup> 中國時報（臺北），民國93年5月26日，第A14版。

<sup>37</sup> 蕭新煌，新臺灣人的心（臺北：月旦出版社，1999年12月），頁141。

<sup>38</sup> 黃俊傑，「論臺灣意識的發展及其特質」，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一九九九年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年6月），頁1-2。

臺灣只有作為中國地方意識的「漳洲意識」、「泉州意識」或「閩南意識」、「客家意識」等；到了日本統治臺灣以後，作為被統治者的臺灣人集體意識的「臺灣意識」才出現，這半世紀（1895～1945）的「臺灣意識」既是民族意識又是階級意識；1945年臺灣光復後，「臺灣意識」基本上是一種省籍意識，尤其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作為反抗以大陸人占多數而組成的國民黨政權的臺灣人意識加速發展；1987年戒嚴令廢除，臺灣開始走向民主化；近年來由於中共政權對臺灣的種種打壓，「臺灣意識」乃逐漸成為反抗中共政權的政治意識。

楊國樞在「中國論壇」創刊十二週年專輯總結報告中說<sup>39</sup>：

日據時代所謂臺灣派、祖國派的臺灣意識是一種殊相，而其背後實際上是以中國意識為共相，亦即臺灣意識是中國意識的另一個層面；不過戰後（尤其是臺獨運動之下）的臺灣意識，實際上係以否定祖國意識及漢民族意識為出發點。因此就比較少，或者說沒有了中國意識。在1940年代，也就是太平洋戰爭的決戰時期，一直到光復，甚至迄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後的初期，臺灣民眾的中國意識還是相當濃厚，至少從40年代的臺灣文學來看，並無任何所謂根深蒂固的「臺灣結」的意識。臺灣人是中國人，這一點是一個種族的、歷史的、文化的及語言的事實；臺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屬類。其中歸納出幾種必須明辨的糾葛：一、在臺灣近代史裡，過去的漢人意識實際上是同時包括了中國意識和臺灣意識這兩個層次，臺灣意識也是漢人意識的一種。二、臺獨意識事實上已經超越了臺灣意識，它是在某種臺灣意識之外，往前更加上一個分離意識，很多種臺灣意識裡並沒有包含分離意識。三、臺灣要民主化必須先走臺灣路線，然後將來再走中國化的路線。

黃光國認為<sup>40</sup>：

「臺灣意識」是生活於臺灣地區的民眾自生的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政府機構基於某一特定動機所制定的意識形態。職是之故，「臺灣意識」並不像「中國意識」那樣，有十分特定的具體內容。相反的，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臺灣意識」往往展現出不同的意涵和風貌。我們可以將各種不同的「臺灣意識」依其所含「政治成分」的多寡，定位在一條連續的「續譜」之上。這條「續譜」的一端，是政治成分極淡的「鄉土意識」；「續譜」的另一極端，是政治成分非常濃烈的「臺獨意識」；在「續譜」之間，則是各種「現實主義」的臺灣意識。而此「臺灣意識」又可分為三大類：

<sup>39</sup> 楊國樞，「中國結與臺灣結」研討會總結報告，中國論壇（香港：第289期，1987年10月10日），頁197-202。

<sup>40</sup> 黃光國，楊青矗編，「臺灣結與中國結的社會心理分析」，臺灣命運中國結（高雄：敦理出版社，民國76年7月15日），頁126-130。

### 一、鄉土意識

是一種自生的「臺灣意識」，也是一種政治成分最為淡薄的「臺灣意識」。在臺灣成長、生活的人，對自己的母社會產生一種孺慕依戀之情，是一種十分自然之事。進而在意識上要求「認同臺灣、關懷社會」，這便是「鄉土意識」的由來。

### 二、臺獨意識

「臺獨意識」是一種包含有強烈政治意識在內的「臺灣意識」。它是針對「中國意識」的一種反動，也是反對國民黨人士用以抗拒執政黨的一種意識形態。

### 三、現實主義式的「臺灣意識」

近年來，臺灣經濟快速發展，中產階級勃然而興，大多數中產階級雖然贊成溫和的政治改革，可是他們都害怕暴力革命會摧毀他們多年來的努力成果。因此，他們雖然也可能懷有「臺灣意識」，他們卻反對蘊涵有暴力成分的「臺獨意識」。在各種社會力量的交互作用之下，也祇能和現實妥協，而發展出「現實主義式」的「臺灣意識」。

楊青矗認為<sup>41</sup>：

戰前臺灣意識的形成，是為了抵抗日本人，因臺灣在三、四百年的歷史中，不被中國大陸政權重視，都是「鳥不語、花不香」荒蠻的邊疆棄兒，滿清並將臺灣割給日本。使臺灣一直處於大陸政治圈之外，為了抗日，有一部分人對祖國不存寄望，而形成臺灣意識。

但多數戰前的臺灣知識分子，在抗拒異族統治下，對中國大陸的祖國充滿寄望。這個夢多數人因二二八事件及國民黨不夠民主破滅了，而變成強烈的臺灣意識。

施正輝認為<sup>42</sup>：

臺灣意識就是「感覺到自己是臺灣人的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being Taiwanese)，也就是「臺灣認同」或是「臺灣人認同」(Taiwanese identity)。

臺灣意識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一種多面向(multi-dimensional)、多層次的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因此會有多形式的呈現；其界定的因素會隨著時空的推移而有所遞嬗，其構成的要素之間不一定會相互調和的。由於我們在定點看到的認同是局部的、割裂的，因此不同的人對它當然有片斷的、選擇性的、甚至迥異的詮釋。

謝長廷認為<sup>43</sup>：

<sup>41</sup> 楊青矗，「臺灣命運中國結—為臺灣意識與中國情結尋共識」，同上註，頁 209-211。

<sup>42</sup> 施正鋒，「臺灣意識的探索」，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一九九九年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9-86。

<sup>43</sup> 謝長廷，楊青矗編，「新的臺灣意識和新的臺灣文化」，臺灣命運中國結，頁 142-146。

「臺灣意識」一詞，在政治、社會、文藝、文化的問題中，經常成為爭論的中心。不過，我們也不時發現，互相攻擊對立的雙方，對「臺灣意識」的內涵，彼此界定並不一致，也往往因而失去焦點而變成各說各話。

理論上，「臺灣意識」至少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

一為「省籍意識」通常指相對於「外省人」或「大陸人」的「本省人」或「臺灣人」意識，它強調的是「出身血統」。

一為「住民意識」通常指相對於「大陸人民」的「臺灣住民」意識，或相對於「中國意識」的「臺灣本土」意識，它強調的是「所在土地」。一般使用「臺灣」兩字時，究竟指的是何種層次的意識？有時並不嚴謹。

前立法委員朱高正認為<sup>44</sup>：

「臺灣意識」的形成，有其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層面的繁複背景，在臺灣的近現代史上也不乏其建構「文化主體意識」的積極意義。但是，當朝野各黨競相以民粹、媚俗的語言爭取選票時，「臺灣意識」也可能在相激相盪之下，一方面不斷被強化、被無限上綱，另一方面卻也被過度化約、甚至扭曲，從而變成封閉、排他的宗派性情結。

「臺灣意識」是臺灣歷史發展的產物，基本上可以做為一種「精神現象」來加以觀察。「臺灣意識」固然是歷史的產物，卻是一個仍在發展中的概念，而且是個經驗概念，不是理性概念。理性概念是先天有效的，譬如正義或至善的理念；經驗概念則只有在特定時空條件下才有效，譬如忠君思想或本土意識。任何把臺灣本土意識絕對化、封閉化、定型化的企圖，都是非理性的作法，違反歷史發展的法則。而任何未經理性殿堂嚴格審視過的意識形態，也不適做為道德和價值判斷的最高準則。然而，在各黨派相激相盪之下，臺灣意識已發展成「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的民粹訴求，其中夾雜著道德性的宣示、選票結構的考量，同時也摻混著對臺灣前途的焦慮和身分認同的危機。

曾健民(原大陸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sup>45</sup>：

80年代以來，隨著臺灣社會的劇變以及臺獨運動的蓬勃發展，「臺灣意識」不斷地被反覆宣傳，已成為臺灣近二十年來成長最快且影響最深遠的社會意識；但是總的來看，它的意含卻一直未有一個全面的明確的闡述。

<sup>44</sup> 朱高正，*臺灣意識的困境與出路*（臺北：豪信出版公司，1998年9月），頁20。

<sup>45</sup> 曾健民，「臺灣意識辨析」，*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一九九九年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647。

談到臺灣意識，難免會在腦際浮現一大堆混雜的名詞、概念、事件、人物，抓不到頭緒，但是絕大部分的人也大概都會先想到，近二十年來成為主要社會意識之一的、作為臺獨運動的核心理念的那個臺灣意識，還有，它不僅是現實意識，而且是生成於臺灣四百年的特殊歷史過程中的歷史意識；最重要的，它還是全體臺灣人必然共有的精神特徵。

趙玉福（原大陸學者擔任國家信息中心臺研究室主任）<sup>46</sup>：

他認為臺灣意識不同於「臺灣人意識」，二者有重疊又有區別。「臺灣人意識」是一個很寬泛的範疇，而臺灣意識是一個特定的概念。在開始形成的初期，也許只是鄉土的、地理的，但發展到今日已成為一個敏感的思想政治概念。究其涵義，簡言之，即人們在思想感情上和意識深處對臺灣的認同和定位。它不僅表現在血緣、地理、歷史、社會、文化、心理等諸多方面，也明顯地表現在政治上。由於對這一概念的解釋者，在政治理念、立場方法、知識閱歷等諸多方面存在差異，使這一概念明顯地存在著模糊性和複雜性。

臺灣意識的內涵雖然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但其政治傾向卻愈來愈鮮明。說它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其內涵表現為動態的，隨著歷史的進程在不斷變化，其發展趨向難以預測；二是不同類型不同觀念的人對其解釋並不完全一樣，彷彿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三是其本身似乎左解釋右解釋均可，具有很大的彈性空間；四是在對其詮釋的時候，似乎難以暢所欲言，有許多只能靠思而得之的「潛臺詞」，時而呈現出一種「模糊狀態」。這種不確定性貫穿於其整個發展過程中。儘管如此，其內涵的政治傾向卻始終不難窺見，而且有愈來愈鮮明的趨勢。它自始至終強調的是「臺灣優先，臺灣第一」，這種強烈的「唯我其誰」的意識，有力地抵制過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現在又基本同化了國民黨執政者，下一個抵制的目標，毋庸諱言，顯然是中國之統一。

從上述兩岸學者專家的研究看來，雖不能完全掌握臺灣意識的真正內涵，但大致上應可看出一個輪廓，雖然這個內涵極其複雜、模糊，並仍在不斷變化中，同時也發現任何人走進臺灣歷史，必會為其近代詭異極端的變遷感到莫明的唏噓。從滿清統治到日本殖民地控制，從國民黨政府的外省籍支配到今天的快速民主化，再加上二二八事件的陰影，短短一百年間，各種傳統和現代力量的交替與變奏，形塑出

<sup>46</sup> 趙玉福，「臺灣意的複雜性及與中國意識之關係」，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一九九九年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16-626。



臺灣人今天獨特的歷史心理與政治視野<sup>47</sup>。無疑，在這整個過程中，廣義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扮演了一重要的角色，然而若將臺灣近代歷史的變遷簡單地看成是近代中國歷史變遷的延伸，恐未必正確，因為，臺灣意識的轉變，基本上，是中國大陸對臺灣人民不斷的衝擊所造成的結果。

由上述的認知，對臺灣意識作一扼要的歸納可以發現：

「臺灣意識」只是許多不同的特殊的臺灣社會意識的總稱；基本上，它是反映臺灣的特殊政治、經濟處境的特殊社會意識。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外在刺激和內在環境下，會有不同內容的「臺灣意識」。

臺灣意識基本上屬於社會意識的範疇，因此它客觀的反映整個社會的現象。當探討臺灣意識時，必須與具體的臺灣政治、經濟、文化或相關的其他因素一起來討論；抽象的、形而上的，與其他的社會條件孤立起來的討論是很難掌握其真義。

任何階段的臺灣意識都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包括一般普羅眾生的下層社會心理，另一個是掌權者操控下系統化的政治作為。前者如臺灣民間信仰對媽祖、關公的崇拜；後者如教育改革、思想改造等。而探討臺灣意識時，一方面要區分兩者，另一方面也要聯繫兩者，因為它們是互為表裡、相互作用的；社會心理和現象會影響政治環境，而政治環境也會有反過來強化社會心理，滿足社會需要。

追根究底，臺灣意識的根源，是百年來帝國主義掠奪或圍堵中國，把臺灣置於其殖民統治或其勢力範圍下的歷史反映；在這歷史過程中，臺灣人民不斷的學習適應新環境，不斷的在夾縫中求生存，並不斷的在抗爭中爭權益，再加上臺灣處於與中國長期分離、隔絕或對峙的狀態，這種狀態下的特殊政治、經濟、社會的進展，產生了各種不同內容的臺灣意識；其中，有與中國意識對立的臺灣意識，也有與中國意識相通的臺灣意識，而主張臺獨的臺灣意識只是各種臺灣意識面向的其中一種。

<sup>47</sup> 王家英，臺灣的民主化與兩岸互動（九龍：田園書屋，1995年9月），頁141。

## 伍、結 論

這次總統大選臺灣社會會造成藍綠對決，人民情緒會如此亢奮，正好反映了這個現象，也就是「臺灣意識」的內涵，在臺灣人民心中尚未沈澱，也尚未定型，仍在不斷相互激盪。

了解了臺灣意識的發展與內涵，可以清楚的發現，臺灣意識本身並無對與錯的區別，也沒有統與獨的差異，基本上他是一個「中性」的名詞，不同的階層、不同的背景、以及不同目的的人，有其不同的詮釋內涵，重要的是臺灣意識的內涵不應該被僵化或定型化，因為它是一個不斷發展轉變並與時俱進的時代產物，它發生於某種特殊的歷史社會結構中，會因這些外在因素與內在環境的刺激而改變或消失，也可能進一步的被強化。

由於過去一百年中臺灣經歷三次政治環境的改變，在歷任統治者對臺灣定位的詮釋頻繁變化下，缺乏世代間縱向的連貫性，因此常出現集體記憶的斷層，讓整體的「臺灣意識」處於紛雜、混亂的局面。

從臺灣歷史的縱向面看，他基本上可以分成第一個時期，日據時期（1895～1945），臺灣意識是以漢民族或中華民族為基礎的一種概念；第二時期，兩岸統一時期（1945～1949）這是百年來兩岸唯一最珍貴的四年統一時間，但也是最不幸的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間，使原本正向發展的臺灣意識第一次受到衝擊；第三時期是國府統治戒嚴時期（1949～1986）也是臺灣意識潛伏、壓抑的時期；第四時期，解嚴開放時期（1987至今），此時期由於壓抑多年的臺灣人民想法如雨後春筍般傾巢而出，碰撞上兩岸人民的交流和中共的打壓，使臺灣意識的內涵更趨多元化。

若從橫向面看，筆者認為臺灣意識的變化，基本上就是臺灣人民在面對不同政權或說新的外來刺激時內部不斷自我調適整合的各種心理、社會、政治的現象反映<sup>48</sup>。

余英時教授早已指出，百年來中國最大的一個動力就是民族主義<sup>49</sup>，而此動力的來源就是對外來壓力的不滿與抗爭。回顧百年來整個臺灣人民所面臨的每一次重大轉折都脫離不了失望、悲憤、不滿、抗爭、期待、再失望的輪迴中，為了求生存，為了求發展，為了民族的尊嚴，為了國家的認同，臺灣人民一次又一次的調整適應

<sup>48</sup> 同註 22，頁 234。

<sup>49</sup>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歷史月刊（臺北：第 29 期，1990 年 6 月），頁 144。

新的環境，試圖建構一個合理生存的環境，而在這個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呈現在外的就是形形色色的「臺灣意識」。其中有傳統鄉土的「臺灣意識」，有異族統治下的「臺灣意識」，有和平改革的「臺灣意識」，有激烈革命的臺灣意識，有自覺無依無靠的「臺灣意識」，也有以怨恨、恐懼為出發點的「臺灣意識」<sup>50</sup>，儘管這些臺灣意識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他們都真實的反應了臺灣人民內心的感受，而這個共通點即是對臺灣的一份情感與熱愛，同時又深受著中國意識的影響與干擾。

而 2004 年臺灣總統大選結果，臺灣人民再一次將「臺灣意識」的內涵傾向明確的表達出來，未來的發展如何？是持續受外在的影響和內部的整合，繼續在滿佈荊棘的道路上蹣跚前進？亦或歷史的軌跡早已命定？尤值觀察。

---

<sup>50</sup> 同註 3，頁 54-73。